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編主五雲王

史學哲代古國中

(二)

著適胡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(二)

胡適著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者纂編總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第六篇 墨子

第一章 墨子略傳

墨子名翟姓墨。有人說他是宋人，有人說他是魯人。今依孫詒讓說，定他爲魯國人。

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，不可不先考定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。如今講墨子的學說，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。這個問題，古今人多未能確定。有人說墨子『並孔子時』史記孟荀列傳。有人說他是『六國時人，至周末猶存』畢沅墨子序。這兩說相差二百年，若不詳細考定，易於使人誤會。畢沅的話已被孫詒讓駁倒了，墨子閒詰非攻中不用再辨。孫詒讓又說：

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，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，而後及見齊太公和魯見

問篇、田和爲諸侯。與齊康公興樂，見非樂上。康公卒。與楚吳起之死。見觀士篇。在安王二十年。上。

距孔子之卒十一年。幾及百年。則墨子之後孔子益信。審覈前後。約略計之。墨子當與子思同時。而生年尚在其後。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。周敬王二十七年也。蓋生於周定王之初年。而卒於安王之季。蓋八九十歲。墨子

序年表

我以爲孫詒讓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確。汪中說：

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。

耕柱篇。魯問篇。貴義篇。

……其年於孔子差後。或猶及見孔子矣。……非攻中篇

言知伯以好戰亡。事在『春秋』後二十七年。又言蔡亡。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。墨子並當時。及見其事。非攻下篇言：『今天下好戰之國。齊晉楚越。』又言『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。』節葬下篇言：『諸侯力征。南有楚越之王。北有齊晉之君。』明在勾踐稱霸之後。魯問篇。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。

亦一證。秦獻公未得志之前。全晉之時。三家未分。齊未爲陳氏也。

檮弓下。『季康子之母死。公輸般請以機封。』此事不得其年。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。楚

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。般固逮事惠王。公輸篇。『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。公輸子自魯南遊。楚作鉤強

以備越。」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。惠王在位五十七年，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，則墨子亦壽考人歟？墨子

汪中所考都很可靠。如今且先說孫詒讓所考的錯處。

第一孫氏所據的三篇書，親士魯問，非樂上，都是靠不住的書。魯問篇乃是後人所輯，其中說的『齊大王』未必便是田和。即使は田和，也未必可信。例如莊子中說莊周見魯哀公，難道我們便說莊周和孔丘同時麼？非樂篇乃是後人補做的。其中屢用『是故子墨子曰：爲樂非也』一句，可見其中引的歷史事實，未必都是墨子親見的。親士篇和修身篇同是假書。內中說的全是儒家的常談，那一句墨家的話。

第二，墨子決不會見吳起之死。呂氏春秋上德篇說吳起死時，陽城君得罪逃走了，楚國派兵來收他的國。那時『墨者鉅子孟勝』替陽城君守城，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內。孟勝將死之前，還先派兩個弟子把『鉅子』的職位傳給宋國的田襄子，免得把墨家的學派斷絕了。照這條看來，吳起死時，墨學久已成了一種宗教。那時『墨者鉅子』傳授的法子，也已經成爲定制。

了。那時的『墨者』已有了新立的領袖孟勝的弟子勸他不要死，說：『絕墨者於世，不可。』要是墨子還沒有死，誰能說這話呢？可見吳起死時，墨子已死了許多年了。

依以上所舉各種證據，我們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，西歷紀元前五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。西歷紀元前四一六年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十歲六十歲之間。孔子生西歷紀元前四一六年到吳起死時，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。

以上所說墨子的生地和生時，很可注意。他生當魯國，又當孔門正盛之時。所以他的學說，處處和儒家有關係。淮南要略說：

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〔久〕服傷生而害事。墨子究竟曾否『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』，我們雖不能決定，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響，一定不少。呂氏春秋當染篇說史角之後在於魯，可見墨子在魯國受過教育。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後，那一班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學說的大端，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。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種種故事，那一樁不是爭一個極小極瑣碎的禮節？如曾子弔於負夏及曾子喪妻而弔諸條。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，真

可令人駭怪。墨子生在魯國，眼見這種種怪現狀，怪不得他要反對儒家，自創一種新學派。墨子攻擊儒家的壞處，約有四端：

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：儒以天爲不明，以鬼爲不神，天鬼不說。此足以喪天下。又厚葬久喪，重爲棺槨，多爲衣衾，送死若徙，三年哭泣，扶然後起，杖然後行，耳無聞，目無見。此足以喪天下。又弦歌鼓舞，習爲聲樂。此足以喪天下。又以命爲有。貧富壽夭，治亂安危，有極矣，不可損益也。爲上者行之，必不聽治矣；爲下者行之，必不從事矣。此足以喪天下。墨子公孟篇

這個儒墨的關係，是極重要不可忽略的。因爲儒家不信鬼，孔子言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「未能事神，焉能事鬼」。又說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說苑十八記子貢問死者無知，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。賜欲知死者有知耶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。欲言死者無知，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。賜欲知死者有知無知也？死徐自知之，猶未晚也。此猶是懷疑主義（Agnosticism）。後來的儒家直說無鬼神，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「無鬼神」。此直是無神主義（Atheism）。所以墨子倡「明鬼」論。因爲儒家厚葬久喪，所以墨子倡「節葬」論。因爲儒家重禮樂，所以墨子倡「非樂」論。因爲儒家信天命，論語子夏說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」。孔子自己也說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」。又說「道之將行也歟！命也。道之將廢也歟！命也」。所以墨子倡「非命」論。墨子是一個極熱心救世的人，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，心中不忍，所以倡爲「非攻」論。他

以爲從前那種『弭兵』政策，如向戌的弭兵會都不是根本之計。根本的『弭兵』要使人人『視人之國，若視其國，視人之家，若視其家，視人之身，若視其身。』這就是墨子的『兼愛』論。

但是墨子並不是一個空談弭兵的人。他是一個實行非攻主義的救世家。那時公輸般替楚國造了一種雲梯，將要攻宋。墨子聽見這消息，從魯國起程，走了十日十夜，趕到郢都去見公輸般。公輸般被他一說說服了，便送他去見楚王。楚王也被他說服了，就不攻宋了。參看墨子公輸篇 公輸般對墨子說：『我不會見你的時候，我想得宋國。自從我見了你之後，就是有人把宋國送給我，要是有一毫不義，我都不想要了。』墨子說：『……那樣說來，彷彿是我已經把宋國給了你了。你若能努力行義，我還要把天下送給你咧。』

篇問

看他這一件事，可以想見他一生的慷慨好義。有一個朋友勸他道：『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，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？我勸你不如罷了。』墨子說：『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，九個兒子好喫懶做，只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。喫飯的人那麼多，耕田的人那麼少，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該格外努力耕田纔好。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，你正該勸我多做些纔好。爲什麼反來勸我莫做呢？』

這是何等精神！何等人格！那反對墨家最利害的孟軻道：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。」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，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。試問中國歷史上，可曾有第二個「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」的人麼？

墨子是一個宗教家。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，一面却講究祭禮喪禮，他說：「不信鬼神，却要學祭禮，這不是沒有客却行客禮麼？這不是沒有魚却下網麼？」公孟篇所以墨子雖不重喪葬祭祀，却極信鬼神，還更信天。他的「天」却不是老子的「自然」，也不是孔子的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的天。墨子的天，是有意志的。天的「志」就是要人兼愛。凡事都應該以「天志」爲標準。墨子是一個實行的宗教家。他主張節用，又主張廢樂，所以他教人要喫苦修行。要使後世的墨者，都要「以裘褐爲衣，以跂蹠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」這是「墨教」的特色。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的行爲，說：

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，其行則非也。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，以腓無股脰無毛相進而已矣。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

又却不得不稱贊墨子道：

雖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。將求之不可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。才士也夫！
認得這個墨子，纔可講墨子的哲學。

墨子書今本有五十三篇，依我看來，可分作五組：

第一組。自親士到三辯，凡七篇，皆後人假造的。

黃震宋濂所見別本、此七篇題曰經。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。

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。

第二組，尚賢三篇、尚同三篇、兼愛三篇、非攻三篇、節用兩篇、節葬一篇、天志三
篇、明鬼一篇、非樂一篇、非命三篇、非儒一篇，凡二十四篇。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
作的。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。非樂、非儒兩篇更可疑。

第三組，經上經說下大取、小取六篇。不是墨子的書，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。我以為這
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『別墨』做的。這六篇中的學問，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。況且
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。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面。所以我以為

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『別墨』做的。我從來講墨學，把這六篇提出，等到後來講『別墨』的時候纔講他們。

第四組，耕柱 貴義 公孟 魯問 公輸 這五篇，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，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。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。

第五組，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。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。於哲學沒甚麼關係。

研究墨學的，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。後讀第三組。其餘二組，可以不必細讀。

第二章 墨子的哲學方法

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，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，在於兩家的『邏輯』不同。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。

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：『善爲政者若之何？』仲尼對曰：『善爲政者，遠者近之，而舊者新之。』

論語作「近者」
悅、遠者來

子墨子聞之曰：『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。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。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？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……』

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。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。墨子所要的是一個『所以爲之若之何』的進行方法。孔子說的是一個『什麼』，墨子說的是一個『怎樣』。這是一個大分別。公孟篇又說：

子墨子問於儒者曰：『何故爲樂？』曰：『樂以爲樂也。』子墨子曰：『子未我應也。今我問曰：「何故爲室？」曰：「冬避寒焉，夏避暑焉，室以爲男女之別也。」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。今我問曰：「何故爲樂？」曰：「樂以爲樂也。」是猶曰：「何故爲室？」曰：「室以爲室也。」』

儒者說的還是一個『什麼』。墨子說的是一個『爲什麼』。這又是一個大分別。

這兩種區別，皆極重要。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，作爲人生的目的，如論政治定說；『君君，臣臣，父父子子』或說『近者悅，遠者來』。這都是理想的目的，却不是進行的方法。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『止於至善』的目的，却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。所說細目，如『爲人君，止於仁；爲

人臣止於敬；爲人父，止於慈；爲人子，止於孝；與國人交止於信。」全不問爲什麼爲人子的要孝，爲什麼爲人臣的要敬；只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。所以儒家的議論，總要偏向「動機」一方面。「動機」如俗話的「居心」

孟子說的：「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」存心是行爲的動機。大學說的誠意，也是動機。儒家只注意行爲的動機，不注意行爲的效果。推到了極端，便成董仲舒說的：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只說這事應該如此做，不問爲什麼。應該如此做。

墨子的方法，恰與此相反。墨子處處要問一個「爲什麼」。例如造一所房子，先要問爲什麼要造房子，知道了「爲什麼」，方才知道「怎樣做」。知道房子的用處是「冬避寒焉，夏避暑焉，室以爲男女之別」，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暑，始能分別男女内外。人生的一切行爲，都是如此。如今人講教育，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。於是大家都去開學堂，招學生。大家都以爲興教育就是辦學堂，辦學堂就是興教育。從不去問爲什麼該興教育。因爲不研究教育是爲什麼的，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，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。我去年回到內地，有人來說，我們

村裏該開一個學堂。我問他爲什麼我們村裏該辦學堂呢？他說：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，所以我們這裏也該開一個。這就是墨子說的『是猶曰何故爲室？曰室以爲室也。』的理論。

墨子以爲無論何種事物，制度，學說，觀念都有一個『爲什麼』。換言之，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。知道那事物的用處，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事事物物既是爲應用的，若不能應用，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，便應該改良了。例如墨子講『兼愛』便說：

用而不可，雖我亦將非之。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？
兼愛

這是說能應『用』的便是『善』的；『善』的便是能應『用』的。譬如我說這筆『好』，爲什麼『好』呢？因爲能中寫，所以『好』。又如我說這會場『好』，爲什麼『好』呢？因爲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，所以『好』。這便是墨子的『應用主義』。

應用主義，又可叫做『實利主義』。儒家說：『義也者，宜也。』宜即是『應該』。凡是應該如此做的，便是『義』。墨家說：『義利也。』經上篇參看非攻下首段。便進一層說，說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『義』的。因爲如此做纔有利，所以『應該』如此做。義所以爲『宜』，正因其爲『利』。

墨子的應用主義，所以容易被人誤會，都因為人把這『利』字『用』字解錯了。這『利』字並不是『財利』的利，這『用』也不是『財用』的用。墨子的『用』和『利』都只指人生行為而言。如今且讓他自己的下應用主義的界說：

子墨子曰：『言足以遷行者常之。不足以遷行者勿常。不足以遷行而常之，是蕩口也。』

篇貴義耕柱

子墨子曰：『言足以復行者常之。不足以舉行者勿常。不足以舉行而常之，是蕩口也。』

篇貴義耕柱

這兩條同一意思。遷字和舉字同意。說文說：『遷，登也。』詩經有『遷於喬木』，易有『君子以見善則遷』，皆是『升高』、『進步』之意，和『舉』字『擡高』的意思正相同。

後人不解『舉』字之義，故把『舉行』兩字連讀，作一

個動詞解。於是又誤改上一『舉』字爲『復』字。

六個『行』字，都該讀去聲，是名詞，不是動詞。六個『常』字，都與『尚』字通用。

俞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說如此。『常』是『尊尚』的意思。這兩章的意思，是說無論什麼理論，什麼學說，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，始可推崇。若不能增進人生的行為，便不值得推崇了。

墨子又說：

今瞽者曰：『鉅者，白也。豈者，黑也。』雖明目者無以易之。兼白黑，使瞽取焉，

俞云、鉅當作豈。豈者，瞑之假字。

黔者，黑也。』

不能知也。故我曰：『瞽不知白黑』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。

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，雖禹湯無以易之。兼仁與不仁，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：『天下之君子不知仁』者，◎◎◎◎◎◎◎◎非以其名也，亦以其取也。貴義篇

這話說得何等痛快！大凡天下人沒有不會說幾句仁義道德的話的。正如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，也會說白黑的界說。須是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，纔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。高談仁義道德的人，也是如此。甚至有許多道學先生一味高談王霸義利之辨，却實在不能認得韭菜和麥的分別。有時分別義利，辨入毫芒，及事到臨頭，不是隨波逐流，便是手足無措。所以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，或幾句虛空的界說，算不得真『知識』。真『知識』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。

這就是墨子哲學的根本方法。後來王陽明的『知行合一』說，與此說多相似之點。陽明說：『未有知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』很像上文所說：『故我曰：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亦以其取也。』之意。但陽明與墨子有絕不同之處。陽明偏向『良知』一方面，故說：『爾那一點良知，是爾自家的準則。爾意念著處，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。』墨子却不然，他的是非的『準則』，不是心內的